

# 第 1 章

## 绪 论

### 1.1 引言

生态语言学发展至今已有 50 年的历史，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加剧以及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受到国内外不同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背景各异的学者秉持对语言和生态环境问题的共同关注，将不同的语言学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与生态学原理和方法结合起来，尝试通过语言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语言系统及语言使用方面的研究，来解决语言象征环境、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认知心理环境中的生态问题。这种多学科间的融合使生态语言学具备交叉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并逐渐呈现出超越生态学、生物学、语言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超学科”特性（何伟，2018；何伟、魏榕，2018a），同时也为其学科内涵的定义、研究范畴的界定造成了一定困难。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逐渐形成。生态语言学研究呈现出地域不断扩大、范式趋于融合、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以及生态哲学观趋于统一的发展趋势。本章通过梳理生态语言学的缘起、发展历程及研究现状，对目前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 研究路径等进行界定，从而为建构生态话语分析理论框架奠定基础。

## 1.2 生态语言学缘起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生活水平逐渐提升，但与此同时，人口压力、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也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研究生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生态学（Ecology）（Haeckel, 1866）——应运而生。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人们生态意识的不断提高，生态学的观点及视角开始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生态”这一概念也已从最初的生物生态、环境生态延展到语言生态、人口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等。可以说，任何与环境（包括生物环境及非生物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活动都与“生态”二字密切相关。而语言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同样也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早在 19 世纪初期，普通语言学奠基人、德国哲学家和语言学家 Wilhelm von Humboldt 在进行“总体语言研究”时，从哲学角度关注语言本质、语言内在形式及语言类型等问题，将“探究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作为普通语言学所承担的重要任务之一（洪堡特，1836/1999）。他认为，人类语言的多样性是人类精神的内在需要，语言的特性差异实际上反映民族思维方式和活动感知方式的不同（洪堡特，1811/2001a, 1829/2001b）；语言像人一样会经历产生和死亡的自然进程，但消亡的语言并非失去“生命”，而是通过混合产生新的语言（洪堡特，1836/1999）。由于 Humboldt 更多关注语言差异对人类认知层面及精神发展造成的影响，将语言的消亡看作是一种必然过程，因此并未产生对濒危语言的保护意识。一个多世纪后，受 Humboldt 语言和文化具有多样性观点的影响，美国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 Edward Sapir（1912）对多种语言和文化进行进一步研究，超越语言在结构、语音系统以及词义等层级的描述，对语言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建立进行了初步尝试。值得注意的是，Sapir 所提及的环境（environment）没有停留于其生态意义（ecological meaning），而是更强调物理和社会环境（physical and social surroundings）。他认为，词汇是最能反映说话者环境特征的语言因素，它不仅能反映说话者所处环境的地形特征、文化背景的复杂性，还能

反映由地形和文化所影响的人们的兴趣倾向。无论是 Humboldt 关于人类语言的哲学思想，还是 Sapir 对于建立语言与环境关系的初步尝试，一百多年来，人们都在思考语言多样性以及语言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些努力为语言学家进行语言生态研究以及积极探索语言在解决环境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0年，Einar Haugen 在奥地利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O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s”的学术报告，用动物、植物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来类比语言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并用 ecology of language 一词——也称 language ecology——来表示语言生态，即对语言与多语社团（multilingual community）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的一种新型生态学研究。1972年，Haugen 将这一术语收录进其论文集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并进一步将 language ecology 定义为“任意一种语言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Haugen, 1972: 325），这里的“语言环境”指语言实际被使用、被解码的社会环境。Haugen（1972）认为，语言生态的一部分是心理的，表现在双语者和多语者思想中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部分是社会的，指语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然而，Haugen 并不是第一位将生态概念与语言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学者（Fill, 1993; Steffensen, 2007; Eliasson, 2015）。在此之前，美国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 Voegelin 等人（Voegelin & Voegelin, 1964; Voegelin et al., 1967）曾使用 linguistic ecology 一词表达“语言生态”概念，认为语言生态是“从独立存在的单一语言转向相互联系的多种语言的研究”（Voegelin & Voegelin, 1964: 2），强调对一个特定地区中所有语言的全面关注，如 Voegelin et al.（1967）对美国西南部多种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研究，以及 Mühlhäusler（1995）对殖民化、西化与现代化影响下的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语言与生物的多样性进行考察等。

1985年，法国语言学家 Claude Hagège 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角度研究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演变与进化以及语言的退化与消亡等问题，并发现 19 世纪的许多语言学者被生命科学激发的强劲思潮所吸引，开始将生物学研究的模型和术语运用到人文科学中（克洛德·海然热，2012）。Hagège 在《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一书中提出

écolinguistique (ecolinguistic) 一词, 认为其“专门研究经过文化加工的‘天然’参照物怎样进入语言, 例如方向、地理特点、人类的栖居方式或宇宙因素等”(克洛德·海然热, 2012: 261), 即探索自然现象与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 之后被翻译为“环境语言学”。这也是学界最早使用 ecolinguistic 这一术语来表述与语言和自然相关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 Hagège 认为, 人们在用语言谈论世界的同时, 也是对世界加以再造。这一观点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家 Halliday (1990) 所提出的“语言建构世界”的观点不谋而合。在 1990 年的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上, Halliday 针对语言系统与生态因素发表了题为“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的主旨报告, 对语言系统之于某些生态现象的不合理表述进行了批评, 关注语言学研究在解决生态问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将语言对世界的影响描述为“系统与事件之间的辩证法”(Halliday, 1990/2001: 186), 认为语言并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 而是“语言主动建构现实”(Halliday, 1990/2001: 196), 强调增长主义(growthism)、等级主义(classism)、物种歧视(speciesism)、环境污染等不只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的问题, 同样也是语言学家应该关注的问题。同时期在国内, 李国正(1987, 1991)将语言置于自然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研究, 开始运用生态学原理研究汉语问题, 在了解多层次、多功能的语言基础上, 引入生态系统的基本原则, 继而提出“生态语言系统”概念(李国正, 1991: 35)。他将语言系统的生态环境分为外生态环境系统和内生态环境系统, 将汉语分为五种不同的生态类型, 并提出了生态汉语学的研究方法, 如系统分析法、实验法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语言生态学”(language ecology 或 ecology of language) 或“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 或 ecological linguistics) 为主题的著述, 如此一来, 生态语言学的学科理论框架逐渐丰富起来(范俊军, 2005)。

此外, 一些德国学者(Mackey, 1980; Finke, 1983; Fill, 1987; Tramp, 1990; Mühlhäusler, 1992, 1995)将此类生物生态学与语言学的概念、原理相结合的研究称为 ecological linguistics。国内也有学者(范俊军, 2005; 韩军, 2013)将“生态语言学”与“语言生态学”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 认为它们指代同一学科(黄国文, 2016)。在第

九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上，有学者提出使用 eco-linguistics 作为语言与生态关系问题研究的统称（何伟，2018：11）。这表明，无论是“语言生态学”还是“生态语言学”，尽管在不同研究范式中各有侧重，但“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一词更能体现该类研究是一个具有超学科属性的、统一的学科。

## 1.3 生态语言学发展历程及研究现状

生态语言学发展至今的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0—2001年，以Haugen首次提出“语言生态”为起始点，至Fill和Mühlhäusler（2001）为推动学界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系统回顾30年来不同领域的生态语言学思想而主编的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第二个阶段是21世纪以来至今，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许多新兴学科的出现为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加之生态语言学在各个领域的探索有了一定的进展，不少语言学家也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哲学思想在生态语言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呈现继往开来的特点。

### 1.3.1 发展历程

“生态语言学始于一个隐喻”（王晋军，2007：54）。Haugen（1972）提出的“语言生态”概念开创了语言学与生态学研究相结合的新模式。20世纪80年代，基于Haugen的语言生态隐喻思想，许多学者开始将生物生态学的概念和原理以不同的方式用于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现象研究（Fill，1998），少数民族濒危语言逐渐成为语言学家关注的热点，尤其表现在太平洋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以及“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问题的研究中。例如，Mackey（1980）将Haugen的“语

言的生态学”发展为“语言转用 (language shift)<sup>1</sup>的生态学”，并提出语言学家区分语言形式和语言行为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语言和语言使用都与社会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Dension (1982/2001) 通过研究欧洲语言多样性及其近年来的生态变化，进一步证实了生态隐喻思想的适用性，明确提出语言生态离不开语言经济 (language economy) (Weinrich, 2001)，以及“语言种类的保护是否应与濒危自然物种的保护并驾齐驱”的问题 (Dension, 1982/2001: 77)。此外，Dension 还指出语言生态隐喻思想具有一定局限性：自然生态是有生物居住的，因此它们显然是有界的 (bounded) 自然种类，但语言的边界并不明确，且互通性很强，这就给语言的生态研究带来了不确定性。

Haugen 的语言生态隐喻思想奠定了生态语言学的第一种主流研究范式，主要涉及生态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哲学等学科领域，被学界称为“豪根模式”“隐喻模式”或“语言的生态学” (Fill, 2001; 范俊军, 2005; 韩军, 2013)。在此研究范式之下，许多语言学家从语言与环境的关系入手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1) 对语言生态现象的原因进行剖析，如通过研究少数民族语言，阐述为何有些语言的生存受到威胁，而另一些语言却得以幸存 (Krier, 1996)；Bastardas-Boada (2018) 还通过关注“语言可持续性” (linguistic sustainability)，强调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之间的联系。(2) 对语言环境、语言生态系统进行理论建构，如 Haarmann (1980, 1986) 建立了生态语言学变量，其中包括种族人口统计、种族社会、种族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因子，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语言的“环境”；Finke (1983, 1996) 用生态系统 (ecosystem) 概念转指语言世界系统 (language world system) 和文化系统，将生物生态和语言进行比较，指出人类使用语言的方式就如同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即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了对生命创造力的威胁，对语言的不合理使用造成了语言的濒危和消亡；Trampe (1990) 赞同上述 Finke 的观点，指出语言的生态系统由语言、语言使用以及与之相互作用的环境构成。近年来，还有生态语言学家将语言与政治联系起来，认为政治活动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生态环境 (symbolic

1 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中的一部分人放弃了本族的母语而转用另一种语言的现象，是不同语言之间功能竞争的结果。

ecology of language)(Steffensen & Fill, 2014)。他们(Skutnabb-Kangas & Phillipson, 1995)关注语言人权(linguistic human rights)和语言权利(language rights),认为个人和团体有权利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进行交流和接受教育,语言像个人或团体一样具有“法律人格”(legal personality),同样也享有相应的权利。

20世纪90年代,生态环境的恶化进一步推动了语言与生态的研究,语言学家开始探索语言在生态环境问题中所起的作用,尝试将语言作为解决环境问题方式中的一种。Halliday(1990/2001)首先关注到语言及语言学在环境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强调语言与增长主义、等级主义和物种歧视之间的关系,劝告语言学家不要忽视自己的研究对象(语言)在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中所担当的角色。Halliday认为,语言不仅能反映世界,还能够建构世界,同时也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人们对世界的许多不合理认知都来自于语言系统(或语法),这种“人类头脑中对世界的认知”被Stibbe(2015)称为“故事”(story):不同生存背景下的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不同,由此形成的生态理念和对待生态环境的方式也就不同。自然资源的无限性和人类享有特权地位的思想意识已经内化在语言系统中,这对人类形成良好的生态理念以及环境问题的解决产生了阻碍作用。

Halliday对于语言在环境问题中作用的思考为生态语言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被称为“韩礼德模式”“非隐喻模式”“环境(的)语言学”(Fill, 2001; 范俊军, 2005; 韩军, 2013)。“韩礼德模式”主要涉及生态学、语言学、经济学、环境科学、宗教研究、心理学、哲学以及其他多个领域,重点关注语言对生态所产生的作用,这种作用可能是积极的、和谐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破坏性的。对待能产生积极、有益作用的语言需要鼓励和提倡,而对待产生破坏性作用的语言则需要抵制和改进。

基于“韩礼德模式”,语言学家开始对语言和语言实践(语言系统和语篇)的生态特征和非生态特征进行批评性分析。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路径:

一是运用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简称CDA)(Fairclough, 1989, 1995; van Dijk, 1993; Weiss & Wodak, 2003)

的理论框架，对有关环境的文本进行分析。例如，通过对文本中主动、被动、作格结构的分析（Gerbig, 1993）或对施事、受事的分析（Alexander, 2018），可以看出不同利益群体在描述环境问题时的侧重点和规避点。Goatly（1996: 555）指出，删除施事或受事可以通过名词化（nominalization）的方式来实现，以此来弱化人们对受影响对象的关注（Fill, 1998）。

二是从生态角度对语言系统进行批评性分析。除 Halliday（1990）对语言系统的批判之外，Trampe（2001）通过对比工业化农业和传统农耕农业中的语言现象，对工业化农业语言中表现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和“重商主义”（commercialism）进行批判，认为语言反映世界不能只从人类视角出发，还要关注自然对人类及其商业活动的作用。Goatly（1996）认为在欧洲通用语种中，分化的语言系统不符合现今世界整体化的生态思想，主要表现在：及物性分析将现实世界划分为施事、受事和环境角色，不适于表现当代科学理论或盖亚理论（Gaia hypothesis）<sup>2</sup>；参与者角色中对施事和受事的划分表现了一种错误的单向因果关系，不符合当代科学理论“多向”“互为因果”的特点；将施事、受事的参与者角色与环境角色分化，由状语表达的环境角色通常被边缘化，暗示“环境”既没有能动性，也不会受到影响。因此，Goatly（2007）提出“协和语法”（consonant grammar），也称“绿色语法”（green grammar），即用作格分析法激活在及物性分析中被边缘化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动作过程的参与者，从而加强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重视。

三是从生态角度对社会热点话题文章或环保类话题广告中的非生态特征进行批评性分析。例如，Fill（2000）通过分析 *Times* 和 *Newsweek* 中有关环境问题的广告发现，广告中使用越多“绿色”语言，实际大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越低，从而揭示出部分广告语篇背后虚伪的环保意识；Kahn（2001）在描写动物实验的科学语篇中发现，该语篇全文仅在致谢部分使用代词 I、we 以及主动语态，正文均使用被动语态，这种语言使用习惯表明人们在潜意识中并没有将动物作为与人平等的生

2 指整个世界或盖亚宇宙（如生命、温度、氧气、岩石、大气和水等）组成一个完整的巨大机体，它们可以实现内部的自我平衡（Lovelock, 1988）。



物对待。

在以上三种研究路径中，第一种和第三种属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第二种属于批评生态语言学（critical ecolinguistics）研究内容。生态批评话语分析与批评生态语言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侧重于分析具体语言的使用，通过批判话语或文本中的词法、句法和语用，揭示话语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表现在生态语言学中就是生态意识；而后者侧重于对语言系统中非生态特征的批判（Fill, 1998; Fill & Mühlhäusler, 2001; 范俊军, 2005; 王晋军, 2007），如名词的可数与不可数之分、代词的用法以及语法系统的描写等。Stibbe（2015）提出的批评生态语言学这一概念，从批评性角度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话语”，通过改变语言系统的模式和语言使用方法，使其更加适合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

相比而言，“豪根模式”关注的是语言生态本身，“语言”与“生物”具有相似的发展历程，在生态系统中起到等同的作用；“韩礼德模式”则注重语言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对话语和行为的生态特征和非生态特征进行分析。虽然二者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并不排斥，而是关系互补（Fill, 1998），在促进不同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中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也为二者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 1.3.2 研究现状

自生态语言学兴起以来，通过国内外学界的共同努力，以生态语言学命名的学会组织、学术网站、学术期刊以及论文集大量涌现，国际学术会议定期召开，国内外高校也开始逐步推进生态语言学专业的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多层次人才的培养。

以生态语言学命名的学会组织逐渐遍及全球。就国外而言，1990年，丹麦学者 Jørgen Døør 和 Jørgen Christian Bang 在丹麦创立了一个生态、语言和意识形态研究小组。自2012年起，该小组更名为“人类互动中心”（Centre for Human Interactivity），从认知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视角研究人类的认知如何塑造事件以及人类行为的结果对生态产生的影

响，其组织者也在积极思考如何将“生态语言学”作为组织名称的一部分；1996年，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成立生态语言学分会；21世纪以来，生态语言学的倡导者专门成立了国际应用语言学语言与生态科学委员会，并每年定期召开生态语言学学术会议；2004年，Stibbe初步构建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组织框架，至2017年正式成立，目前拥有1000多名成员；此外，目前较为活跃的巴西“生态语言学团队”拥有220名成员，已出版12本生态语言学方面的书籍，并发表多篇期刊文章。在国内，中国生态语言学会于2017年4月成立，每年召开生态语言学战略发展研讨会及全国生态语言学研讨会或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并组织生态语言学研修班、工作坊等。经过学界共同努力，该学会已于2019年11月加入我国一级学会“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并正式更名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生态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与此同时，有关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四个网站也相继建立并完善，包括语言与生态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ewi.uni-graz.at/ecoling/>）、生态语言学网站（<http://www.ecoling.net/>）、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网站（[ecolinguistics-association.org](http://ecolinguistics-association.org)）和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生态语言学专业委员会网站（<http://ecoling.bfsu.edu.cn>），国内外学者可以在网站查找有关生态语言学的参考书单、生态语言学发展最新动态，还可以进行生态语言学的在线课程学习。目前，国内外以生态语言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期刊相对较少，有Stibbe和Fill共同主编的在线网络期刊*Language and Ecology*，致力于探索与生态相和谐的语篇，以及葡萄牙文期刊*Ecolinguistica: Revista Brasileira de Ecolinguistica*（《生态语言学：巴西生态语言学学刊》）。与此同时，国内外不少期刊都致力于通过专刊或专栏的方式进一步推广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如*Language Science*、*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以及《中国外语》《外语与外语教学》等。此外，有两本论文集收录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生态语言学的文章，内容齐全，涉及生态语言学的多种研究方法：一是*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Fill & Mühlhäusler, 2001），二是*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Fill & Penz, 2018a）。

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语言学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1）研究地域逐渐扩大。生态语言学研究始于欧美国家，现已扩展到